

拉图尔的空间观与人类学： 关于局部与全局的理论探讨

李 晋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人类学希望走出对“地方”的关注，把目光投向更宽广的线路和网络，这场讨论揭示了欧几里得空间观如何塑造了传统人类学对局部与全局的理解。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接续这场讨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在局部追溯影响力的传导，然后把它们串联成对全局的描述，但是网络中的每个节点作为局部互动的发生场所，又在其他方向上是其他行动者—网络的节点。对于拉图尔，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需要在扁平的维度追溯，不像欧几里得空间观那样存在着嵌套关系。把拉图尔的空间观念与其他人类学空间观念对比有助于揭示行动者—网络理论如何打破人类学最潜移默化空间框架和设定，一些新近获奖的作品证明，拉图尔的空间设定已经成为当代人类学最重要的变化。

关键词 拉图尔 行动者—网络理论 空间人类学 人类学方法

作者李晋，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5-0116-14

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挑战了传统社会理论的边界和框架。中国学界已经解释过他的理论如何把传统社会学的“社会”想象成人和物的联结（association）^①，强调物的能动性和意义^②。具体到人类学，国内学者已经用拉图尔的概念和方法分析问题奶粉、垃圾焚烧、农业文化遗产和小农户的现代转型，并介绍拉图尔在环境领域的贡献。^③ 这些研究像拉图尔所说的那样，在更大的人和物的网络中探索不同行动者的作用和角色，显示出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有可能关联于其他领域。

这种跨领域的追溯方法显示出某种独特的空间观。美国人类学者奥本海姆（Robert Oppenheim）指出，相比于科学与技术研究（STS）这个特定的话题，或是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从事自然与文化、社会与技术、以及物与政治的跨界研究，从空间角度理解拉图尔能够回答他的理论对更大的人类学意味着什么。^④ 但是人类学空间转向的研究者却很少提及拉图尔的理论。冯莎和张志培^⑤在梳理人类学田野空间的变化时聚焦 20 世纪

① 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刘珩：《行动者网络理论》，《外国文学》2021 年第 6 期。

② 戴宇辰：《“物”缘何行动？——拉图尔的“物之社会学”考察》，《社会学评论》2023 年第 2 期。

③ 朱剑峰：《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 年第 1 期；张劭颖、李雪石：《环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呈现——对垃圾焚烧技术争议的论域分析》，《社会学研究》2019 年第 4 期；胡梦茵：《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元伦理主体与伦理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李耕：《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的转译与尺度重构——以浙江省泰明县茶产业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司开玲、李德营：《拉图尔与环境人类学之可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④ Robert Oppenheim,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anthropology afte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vol. 7, no. 4, 2007.

⑤ 冯莎、张志培：《人类学田野工作空间的想象与重释》，《西北民族研究》2022 年第 3 期。

90年代的讨论，他们提到了罗安清这个与拉图尔类似的作者，却没有回答罗安清沿着一系列空间位置追踪松茸生态的做法与传统人类学有何异同。张敏把“空间”作为人类学的关键词，她在梳理相关理论时提到了身体、感知、规训、实践、政治经济学和诗性空间等一系列议题，却没有触及拉图尔及其他一些近似理论。^①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本文尝试在人类学空间框架的变迁中解释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意义和特点。^② 拉图尔关注“局部”（local）与“全局”（global）的互动联系，他在论述“局部”时使用“地方”（place）、“地点”（site）、“场地”（locus）或“场所”（location）等表述，在论述“全局”时使用“线路”（route）、“路径”（path）、“踪迹”（trail）和“网络”（network）等词语。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人类学同样使用这些词汇，当时的人类学希望从田野工作置身的“地方”跳入更大的社会文化网络，以应对全球化对这门学科的冲击。本文把拉图尔与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类学空间观念并置。读者将看到，拉图尔用极其新颖的方式打破了局部与全局的对立，破除了欧几里得（Euclidean）几何学对人类学空间框架的束缚。他描绘的“扁平”（flat）的世界挑战了人类学最潜移默化的空间框架，扩展了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一些新近获奖的作品证明，拉图尔的空间想象已经成为当代人类学最重要的变化。

一、拉图尔对传统“地方”观的背离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人类学遵循一种欧几里得式的空间观。在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空间是均匀、连续且可以分割的，距离可以用统一的度量测算。牛顿和笛卡尔在近代科学和哲学中发展了这种观念，空间被想象成完整均质的容器，包裹着前景的实体；空间独立于物体，物体在空间之内占据着位置。^③ 这在通常所说的“地域主义”（regionalism）里被用来形容“地方”和“世界”的关系。世界作为外在容器被想象成平面（surface），在这个平面之上是大小不一的区域（region）或领地（territory）。人类学研究的非西方世界是更加封闭和同质的区域。人们相信在这些地区，地理和人群边界与社会组织和文化的边界是高度重合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学遵循“一个人群、一个地方、一种文化”的空间设定，民族志书写的主要场景是一些内部同质且与外部世界割裂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空间框架受到猛烈的抨击。一些学者强调是人类学认识论和书写装置建构出这种框架。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调查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与外界存在广泛的联系（比如库拉圈和传教网络），但是他把特罗布里恩德岛描述成“狭小封闭”的社区，渲染出一种流落孤岛的氛围。^④ 这种策略把人类学调查的非西方社区与西方世界区别开来，仿佛一个更封闭，一个更开放，分处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⑤ 80年代的“写文化”批判了这种方式。但是，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在反思这场论战时指出，对人类学书写装置的批判要意识到这种书写有漫长的历史，人类学不仅要反思民族志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陷阱，而且要揭示让这种意识形态得以成立的历史条件。^⑥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揭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⑦ 这个学派指出整个世界在15世纪之后经历了普遍的资本主义进程，相比于建构内部同质且与外部割裂的社区，人类学应该关注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跨区域联系，因为这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事实。^⑧ 但是，阿萨德（Talal Asad）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处理“地方”和“世界”的关系时面临两个困境。首先，就算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是每个地区都经历的过程，我们

① 张敏：《空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 较早的几个尝试，参见李晋：《坛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李晋、齐盈瑞：《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看边疆》，《青海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

③ Edward Casey, *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特别是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④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⑤ 乔纳斯·费边：《时间与他者——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何建立》，马健雄、林珠云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⑥ Michel-Rolph Trouillot, *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Boston: Beacon, 1995.

⑦ 范可：《马克思与人类学：一个历史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李晋：《“意识形态”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重要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⑧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也不能用它代替具体的历史，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每个地方带来的是复杂而不是统一的叙事。其次，马克思主义学派假定资本主义吞噬了原本不属于它的地点，这是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非西方世界继续看成与世隔绝的孤岛，没能注意到它们早就向全球力量开放。^① 这里的问题是“地方”和“世界”依然被割裂开来，“世界”作为连接性力量依然在“地方”之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要么用“世界”代替“地方”，要么在自己的理论内部继续接受某种脱离于“世界”的“地方”的存在。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仍然重复了欧几里得式的空间观。在他们的框架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后景，一个可以允许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完整均质的平面。这个由资本主义定义的“世界”包裹着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地方”，跨区域联系发生在这个已经给定的后景和前景之内。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学者尝试把“地方建构”（place making）当作新的解决方案，不再把“地方”和“世界”割裂成两个部分。用古塔（Akhil Gupta）和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话讲，这是从地方、文化和人群之间的广泛联系中探究它们是在怎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才结合成社区，从连接中理解地方认同的建构。^② 以中国学界熟知的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为例：萨林斯关注库克船长在夏威夷人的仪式空间中被当作罗诺神。^③ 在这个例子里，如果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那样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地方世界的冲击，我们可以说夏威夷人是在库克船长到来后才审视自己的宇宙观，没有西方冲击就没有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但是夏威夷人是在与外界的长期互动中形成自己的地方信仰与认识，把库克船长解释为罗诺神只是这个不间断的地方建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尝试。

对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者，理解“地方建构”就像在一个终将成为“地方”的空间区域的边缘看有哪些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在此汇聚。这种做法仍然驻足在某个地点，预设了可以观察的“地方”。虽然在理念上拒绝“地方”的先在地位，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它们并没有超越上面提到的地域主义。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采用不同的做法，在他的框架里，只要注意到某个局部地带的互动（local interaction），研究者就要把观察重心从这个位置移开。拉图尔的理论既强调在具体地点观察，又强调对这些地点的背离：

每个社会科学家都非常清楚他们不应该停留在局部层次的互动，如果你刚好来到这样的舞台，不管是因为什么，你很快会发现该场景下的大部分要素都不是因为你才出现在那里……我们可以说，任何互动都有溢出（overflow）的部分，它们来自其他时间、地点、由其他能动者创造并被带到那里……如果观察者能正视这些溢出所指明的方向，他们就会被从眼前互动带到赋予其形态的其他地点、时间和其他能动性。^④

拉图尔描述的是每个人类学者都能想象的场景：在一场两个人的对话或仪式中，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化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有的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互动双方的身份和角色也已经决定，规定它们的亲属制度、年龄组、宗教社团和组织来自其他场合和地点。如果有器物使用或交换了礼物，物品上的花纹甚至见证着更久远的文明互动与互鉴。相比于人类学在同一地点观察，拉图尔强调是其他场所塑造了这里：“就像有狂风阻止一个人长期驻足在一个地方，把旁观者刮跑；或像是有暗流迫使我们放弃眼前的场景。”^⑤ 简单讲，如果把局部要素拆开，它们必然可以延伸到其他场合和地点；如果没有其他场合的能动性做支持，任何局部都难以存在。这种想法把研究者从一个地点带到多个地点，但是它也不同于人类学的“多点民族志”。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些学者认为田野工作不一定扎根在某个地方，而是可以根据话题在场所（locations）之间切换。^⑥ 按照马库斯（George Marcus）的设想，人类学可以追随人和物的流动，或是思想话语、符号、故事和文

① Talal Asad, "Are There Histories of People without Europe?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9, no. 3, 1987.

②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Marshall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④⑤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65–166, p. 166.

⑥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化记忆的流动。人类学也可以追溯人的生命史对不同场景的串联，或是探寻某一重大冲突对各方力量的调动。^①但是多点民族志仍然专注于真实的地点，不像拉图尔那样在识别地点的同时把目光移开。此外，如何确定多点民族志中的“地点”对拉图尔来说是个重要问题。在下一节，我们将看到他的理论在离开局部的同时，也没有陷入传统意义上的对线路、网络和流动性的讨论。

二、拉图尔对传统“网络”观的背离

90年代的人类学意识到自己必须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打破地域主义对人类学空间观念的禁锢。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把全球化时代的流动（flows）归结为五个领域的景观。族群景观（ethnoscapes）见证着移民、旅行者、难民和全球劳工的涌现；媒体景观（mediascapes）见证着报纸、杂志、电影等流行文化网络塑造着家庭及公共空间；技术景观（technoscapes）见证着科学技术的快速传播；金融景观（financescapes）见证着全球经济与资本冲击着民族国家的版图；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s）见证着与时俱进的宗教和政治思潮推动着国家和党派的抉择。^②全球化伴随着去地化和再地化过程，需要人类学去观察具体地点上的碰撞和摩擦。^③但是阿帕杜莱更在意地点之间的打通，相比于多点民族志去观察不同的“地点”，阿帕杜莱更强调“线路”这个意象。

比如，“景观”（-scape）这个后缀暗示了某种“沿表面滑动”的意象，似乎所有流动都发生在预先决定的平面。阿帕杜莱强调这五种景观是五个相互独立的领域，虽然存在着交错，但是有着各自的动力和逻辑，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五个承载要素流动的带状的平面，它们形成不同的景观。阿帕杜莱特别强调视角（perspectives）的作用。在他看来，面对这五种景观，不同国家、群体和个人能看到的形态是不同的，就像同一片地景在不同方向上呈现不同的样子。地景作为相对稳定的整体横亘在那里，变化的是视角和观看者的位置。这是在暗示在五种景观之外有一个更大的所有人都共享的外在空间做框架，在一些不易察觉的方面，阿帕杜莱引入了欧几里得式的空间观。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包括阿帕杜莱提到的一切要素，但是没有区分“人群”“技术”“金融”“媒介”“意识形态”等范畴。拉图尔没有用一个外在的空间容器包裹网络，也没有把异质性要素纳入预先规划好的平面之内，他也没有让外部的空间关系决定网络内部的关系。拉图尔没有在一个预先给定的空间中铺设线路。行动者—网络不像排水系统、交通设施、电话线路等工程技术网络那样有固定的节点和通道，沿着设计好的线路行进。^④他的网络产生于局部地带发生的影响力的传导，拉图尔这样解释行动者—网络的机制：

联结、相互联结、或是异质事物的联结还不足够，更重要的是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的行动的类型，所以才有了“网”（net）和“工作”（work）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应该用“工作之网”（work-net）代替“网络”（network），因为被强调的是工作、运动（movement）、流动和变化。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网络”这个词，以至于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在谈论互联网或其他类似的东西。^⑤

拉图尔最著名的一点是认为人和非人（nonhumans）都在网络中扮演行动者的角色，要理解这一点，就要看他如何区分另外两种类型的行动者——中介者（intermediary）与转义者（mediator）。这两种行动者都是实体（entities），构成了网络上的节点（nodes）。中介者没有让从中穿过的信息、意志和影响力发生改变，没有对网络产生影响（make a difference）——这在拉图尔的定义里是没有能动性（agency）的表现。与中介者不同，在穿过转义者的过程中，任何输入都有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这在拉图尔那里构成了“工作之网”中的“工作”。转义者可以像黑箱一样产生不可预知的效果，把网络导向任何方向。这也是行动者可以

① George E. Marcus, “Ethnography in / 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4, no. 1, 1995.

② 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3页。

③ Henrietta L. Moore, “Global Anxieties: Concept-Metaphors and Pre-Theoretical Commitments in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vol. 4, no. 71, 2004.

④ Bruno Latour,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 *Soziale Welt*, vol. 47, no. 4, 1996.

⑤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3.

采取非人形式的原因：一台电脑在大部分时候都是静默的参与者（中介者），但是当它在重要基金申请的截止日突然崩溃，就揭示了所有非人都具有转义者的能力。拉图尔认为行动者都是转义者，只不过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那些有固定节点和通道的网络是靠转义者来维持。拉图尔特别关注原有设计走向解体的时刻（比如电脑坏掉的时刻），就是因为在那些时候，行动者（特别是非人）能证明自己在何种程度上维持着网络的稳定。

20 世纪 90 年代，人类学家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给出过一个“边界区域”（boundary areas）的例子，希望反思人类学田野工作对“地方”的预设。克利福德指出，人类学强调在具体地点（site）调查，但是这样一个地点可以是村庄和岛屿，也可以是酒店大堂和站台，后一类地点虽然有边界，但是预示着网络和开放。调查者是经过漫长的移动后才到达自己要研究的地点，穿越了很大一片网络。但是传统人类学把许许多多的“边界区域”从民族志中抹去：

我们可以部分列出（一些被抹去的边界区域）：（1）交通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被抹去——船、汽车、执行任务的飞机，这些科技证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贸易以及不属于田野对象的力量早已有之且从未间断……（2）首都这个全国性的语境被抹去……包括到达村子或是田野点之前经历并产生联系的所有地点。（3）被抹去的还有研究者的大学……（4）各种翻译场所和翻译关系被减少到最无形的程度……^①

这个段落是对“地方”的反思，但是它包含一些反常的质感。首先，它打破了惯常的分类框架，既包括“船”“汽车”“飞机”等实体工具，也包括“村子”“大学”等空间场景，也包括“翻译场所”或“翻译关系”等社会空间。其次，它打破了惯常的尺寸（size）和尺度（scale），“船”“汽车”“飞机”等实体工具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之内，“翻译场所”应该嵌套于“村庄”或“全国”等更大的空间，但是在这个段落，实体工具（同样占据了空间）和不同大小的地理及社会空间被理解成同等性质的“边界区域”，它们只是网络上的节点，区别在于先后发生的顺序。克利福德给出的是一段非常具有拉图尔色彩的论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需要被压平，没有大空间套小空间这样的嵌套结构。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才能说明拉图尔如何挑战了人类学最习惯的欧几里得式的空间观。

三、拉图尔的空间观：拒绝前景与后景的嵌套关系

欧几里得空间观的本质是前景与后景的嵌套关系。空间被假定为一个预先存在且稳定的后景，前景中的实体拥有自身的完整性，可以在空间中移动，它们形成的相互作用发生在空间之中，却不会改变后景的空间。前文提到的地域主义是这种空间观的一个版本。在更普遍的层面，它在人类学中关系到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构建。在美国，这一构建与博厄斯（Franz Boas）对文化性和生物性的区分相关。相对于生物性的统一，人的“文化”被理解为复数的，人类学关注不同地域和人群如何在文化上构成相互区分的单位。文化不仅是差异的内容，更是承载差异的容器和框架，人们想象一个包裹个体的文化空间，用文化来解释个体的心理和行动。在英国，功能主义强调经济、法律、宗教、亲属制度等不同部门的整合，它同样把田野所在的地理空间等同于理论关切的社会空间，并把社会空间理解为界定人群的容器。这样，世界被划分为前景与后景：前景是具体的个体与行动，后景是“社会”和“文化”等带有结构性质的系统（system）或语境（context），它们规定并限制着前景的形式与范围。

人类学总是依靠这种“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方式来操作。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讲，这种操作有其意义，因为要让某个现象突出，就必须为其找到一个后景。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把较小的前景关联于更大的后景，仿佛脱离了语境，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就无法被理解。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那个被称为“社会文化整体”（wholes）的后景是建构的，因为没有任何研究者能看到文化的全部。索顿（Robert Thornton）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情境化”的思维方式关联于人类学的整体论（holism）。虽然没有提到具体学者的名字，但是他暗示了涂尔干、莫斯、弗雷泽、格尔茨、列维-施特劳斯等不同学者的理论。他把这些学者关联到牛

^①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3.

顿——即牛顿创造的欧几里得式的空间观：

在理论中影射某种实体性的外在框架是人类学整体论一直暗含的内容：区别在于我们把它叫作社会的道德训诫、历史的“精神”、被编织起来的实际上不是文本的“文本”，还是人的“天性”。这些外部存在的整体就像牛顿力学中的“无摩擦空间”（frictionless space）那样既不能被作者感知，也不能被他的研究对象感知。它们只能存在于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读者的想象，这是民族志文本建构出的“最根本的幻象”。^①

这正是拉图尔试图反思的内容，在他看来，传统社会理论看到了问题，却提供了错误的解决方案。传统社会理论看到了局部互动需要从外围解释（因为总有来自其他场合的元素在参与），但是把这个外围想象成存在于理论家脑海的行动者背后的体系或语境。这个后方框架是虚拟的，“只有在被举例说明、调动、实现、或是通过身体成为真实发生的局部互动时才不那么抽象”。^② 这样，这个后方框架塑造了前景的互动，又有赖于前景来证明自己，衡量不同理论就是看它们如何处理后景与前景的关系——如何定义宏观体系与微观行动之间的关系，是给予体系以更大的决定性还是给予行动者以更多的自由。研究者会发现自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在聚焦行动时，人们要求他们“把事情放入更大的语境”；在聚焦语境时，人们又要求他们多谈“现实生活”。^③ 这种两难在于这种操作模式本身——前景需要由后景来解释，后景又需要由前景来证实。

绝大多数人类学理论都尝试在这种两难中寻找平衡，比如上面提到的萨林斯的例子，在他的研究里，萨林斯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与皮厄士（Charles Peirce）的语用主义符号学融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用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解释库克船长如何因文化规定的罗诺神的巡游路线被识别为神灵。我们不能详细解释这些理论和细节，简单讲，萨林斯用位于后景的文化解释前景的行动，但是希望回答前景的行动如何推动后景的变化。后景（文化）决定了夏威夷人在象征指代（symbolic reference）中把物（库克船长）绑定于符号（罗诺神）的方式，但是这个过程有两个变数。其一，行动者有可能以不遵从文化预期的方式做出行动；其二，符号作为意义群（meaning-class）有超出物的面相，物在现实中也有符号不能涵盖的特质（property）。库克船长没有在文化预期的时间内离去，由此带来的物和符号的偏差大到无法被后景涵盖。“当部分意义的调整改变了文化范畴的结构关系，就有了体系的变化，人类学家所说的‘结构’……就成了历史的产物”^④，萨林斯用前景和后景的辩证关系解释后景的变化，尝试突破欧几里得空间观对稳定后景的设定，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他还是遵从前景与后景的二分并从后景来解释前景。

传统社会理论不是没有看到建构，它们经常说，“体系与行动者”以及“宏观与微观”是现实抽象出的东西，并不等同于现实，但是学者们还是愿意把注意力放在对这个辩证关系的厘清，似乎只有这样做，人们才能保证有揭示社会行动法则的“理论性”。但是在拉图尔看来，如果这个辩证关系是虚构的，我们就应该转向其他解释。相比于原本不存在的“微观互动”（微观互动不存在，因为任何局部互动总有溢出该地点的其他地方的要素在参与）或“宏观结构”（宏观结构不存在，因为它们是理论家头脑中的建构），研究者应该停止用“社会”“文化”“结构”“秩序”“体系”等社会理论建构的虚拟领域解释真实空间的溢出，而是如实描述这些溢出是如何发生的。拉图尔这样提及萨林斯的理论：

文化不是偷偷站在行动者背后，不管是芝大萨林斯房子一层那个杂乱的办公室，还是牛津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区域资料，我们是在一些具体地点（places）和机构中制造出（文化）这个最具升华性的说法。^⑤

对于萨林斯在解释库克船长时用到的索绪尔，拉图尔这样说：

没有人真正使用语言的结构，但是所有言语（speech）活动还是被认为是在结构中产生。这个言语行为（parole）与语言结构（langue）的关联从索绪尔时代就没人说清……就算语言学家也需要房间、办公室、研究所、一个系、几盒档案、一个落脚的地方、咖啡壶和复印机，以便从数以千计的地方互动和几百万次言语活动中提炼素材来建立语言的结构……并没有任何结构以无意识的方式运作在每次言语活动的“下方”，这当然不

① Robert J. Thornton, "The Rhetoric of Ethnographic Ho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3, 1988, p. 289.

②③⑤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69, pp. 165-170, p. 175.

④ Marshall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p. vii.

意味着它是待在办公室里的“在地”的语言学家想出的事情，它说明研究者应该探寻被写出的结构以何种方式被关联、联结和绑定到所有言语行动。语言学家的办公室与“远方”讲出的话之间当然可能存在联系，但是你在不辛苦建立关联并围绕办公室建立一条条始终进出的管道（conduits）的基础上就想象这些联系？^①

两段文字足以证明，拉图尔拒绝前景与后景的嵌套关系。他反对想象行动的“背后”和“下方”，反对在解释时滑向“后景”和“语境”，反对用“文化”和“语言结构”等理论预设的虚拟领域框定前景和行动。他的空间观念强调虚拟领域有自己的生产地点（sites），它们是在地点串联中被制造出来，耐心追溯这些地点是拉图尔找到的更加“写实”（literalist）和“实证”（positivist）的方法。^②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在行动者背后发现更大的网络，因为这是把背景性框架放到行动的“背后”和“下方”。拉图尔的方法有第三步：第一步是“把全局放入局部”（localizing the global），不想象作为虚拟领域的“全局”而是把它放入具体地点，避免把“全局”看作是行动的背景和语境；第二步是“重新打散局部”（redistributing the local），不想象作为虚拟领域的“局部”，而是解释每个地点的“溢出”来自哪里，避免把“局部”看作是行动的背景和语境。第三步是“串联地点”（connecting sites），即把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地点串联起来，记录影响力的传导，这样一个沿着地点串联的网络呈现了行动者的作用轨迹。由于不存在可以作为虚拟领域的“全局”或“局部”，这样一个网络是不存在“背后”和“下方”的被压平的网络。

四、把全局放入局部

“让局部地点做事”是拉图尔空间观念的关键，关于如何“把全局放入局部”，拉图尔有清晰的概括：

第一步纠偏看上去足够简单：我们必须持续描述那些把一个局部互动与其他地点、时间和其他能动性串联起来的让局部地点做事（a local site is made to do things）的联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追溯委任（delegation）和转译（translation）的发生轨迹……这套操作有可能得到网络，但是我们要保证每一次传导都意味着变化，保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通过完全的转义者而不是中介者实现。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不错过任何一步的基础上呈现地点与地点之间的行动者的链条。^③

之所以要串联行动者，是因为它们有“让其他行动者做事”（make others do things）的能力，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经验层面的基础。拉图尔对“做事”的解释相当含糊，他把“能动性”定义为“产生影响”而不是人的意志和能力，所以他理解的“做事”大体相当于两个事件存在因果联系，或是说一事物引起另一事物发生。比如，他会说，在扇贝、渔网、渔民和海洋研究者之间，“扇贝让渔民做一些事情，就像放在海里的网吸引扇贝黏到网上，渔民和扇贝的存在让数据收集者把它们写进海洋研究”。^④这种在行动者之间发生的影响力的传导不会沿着确定的轨迹行进，因为行动者作为转义者常常带来变数，不确定的传导过程是拉图尔所说的“委任”或“转译”。他会强调，如果行动者以预期的方式输出，那是因为有其他行动者在发挥作用，保证它以固定的方式行事，那些保证它以固定方式行事的行动者本身也是无法预期的转义者，所以这个传导过程是在一系列地点的串联中证明“社会”在离开这些影响力的传导后就无法存在。社会理论探寻的“社会”需要包含微生物、病毒、数字、图表、天气等传统意义上的非社会物（non-social things），只要它们在传导链条上发挥作用。

可以看到，拉图尔的方法非常“在地”，他要避免把社会理论建构的虚拟领域放在行动的“背后”和“下方”。比如，在解释市场交易时，他不会说有一个虚幻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精神”构成市场交易的基础，相反，他会观察这些交易如何在具体地点发生：

一个华尔街交易室确实与“整个世界”相连，通过微小快速的信息通道，每秒有数百万字节传送。这些信息在被交易员消化后又通过记录交易的路透社或彭博社的屏幕反馈到同一地方，然后被传送到“（万物互联的）世界的其他地方”，以确定某个人的净值。我们在解释这些管道时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相信资本主义以

①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67, p. 175, p. 177.

②③④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0, p. 173, p. 107.

某种神秘方式构成世界所有交易的“基础设施”，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跳跃（jump），从对一个具体公司的估值跳到它背后的“场景”，就像是在追溯过程中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直接换挡到平流层，不再采取步步追随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继续步行，在研究华尔街交易室等场所时不切换交通工具，看看这个决定能把我们带向哪里。两种情况得到的是不同的地景（landscapes）……它们给予行动以不同的自由：前一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无处不在”，没有真正的敌人；但是华尔街的某个交易室在上海、法兰克福和伦敦有很多竞争对手——计算机的故障、竞争者的捣鬼、一个意外的数字、定价公式被忽略的变量、计算有可能出现的错误——所有这些都将使账目从暴利变成巨亏。是的，华尔街与很多地方相连，当且仅当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更大”、更有统治力，更统揽一切。但是它并不比法国穆兰的购物中心或科特迪瓦布瓦凯的地方市场更宽、更大、更少具有地方性、更少具有人际互动，或是更缺乏互主性。^①

由于不需要跳到后景，研究者无需担心那个位于“后方”和“下方”的虚拟领域如何与前景连接，这个间距（gap）在拉图尔的理论里被场所与场所的连接取代。“当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再根据行动者的尺寸划分宏观和微观，而是把它们替换为具体且相连的地点，他就开始追溯一个行动者—网络的形成”^②，这个网络不存在更大也更靠后方的“宏观”来包裹更小的“微观”，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建构出层层叠叠的结构。拉图尔描述的是被压平的地势（topography）：没有宏观是“非在地”（non-local）的，因为它们不再是理论建构的虚拟领域；也没有宏观大于微观，因为它们是具体、实在且与微观处在同一维度的场所，只是拥有更多的管道和纽带。对于这样一个被压平的世界，追溯影响力的传导不需要跳到事发地点的背后，从“一个地方”到“没有地方”（no place）；研究者只需要从“一个地方”到“其他地方”，让链条上的每个行动者都能够被追责（accountable）。

拉图尔把诸如股票交易室这样的网络节点称作“微景视域”（oligoptica），把这种追溯方法称为“微景监控”（oligopticon）。这个说法是为了与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比。福柯的全景视域（panopticon）或全景监狱是一个圆形建筑，所有牢房环绕中间的塔楼分布，这种几何布局允许塔楼的监视者看到所有牢房。^③ 微景视域刚好与这种鸟瞰相反：它不是一下子看清全部，因为像股票交易室这样的场所只是网络中的微小一环，观察者能看清的就只有那里，但是从这个微小却必不可少的地点追溯下去，研究者将从一系列坚实的观察中看到整体如何被连接起来。这种努力将证明，在原地建构后景的不只是索绪尔和萨林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建构后景并解释行动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可能把自己的选择归结到“资本主义”等虚拟的后景，或是调动不同尺度的框架解释眼前的行动。拉图尔把这种在一个地方形成的对更高尺度的想象称作“全像”（panorama），在他看来，相比于由学者决定用何种尺度和框架来完成阐释，研究者应该更尊重行动者眼中的全像。人类学在田野中听到的对社会文化的描述在很多时候是报道人从自己角度做出的对全像的描述，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明显更重视这些声音，但是拉图尔想要强调的是这些全像依然是局部的维度之一，需要被折回到局部来诠释。“把全局放入局部”是意识到这些想象性的能量始终发生在具体地点，它们不是理论借助的虚拟领域，而是通过具体路径和管道才和世界发生连接。

五、重新打散局部

在第一步，拉图尔拒绝迈向局部的“背后”和“下方”，强调所有“溢出”都不指向社会理论建构的虚拟领域。这一步解释了前景的溢出不是来自哪里，还没有回答这些溢出究竟来自哪里。“重新打散局部”是解决后一个问题的方案。在通过华尔街交易室这样的局部场所追溯行动者—网络时，拉图尔强调这些场所在其他向度上已经是行动者—网络的结果：

举一个无比简单的例子，你坐在阶梯教室的椅子，听讲的学生在升高的阶梯上环绕着你。我只需要半天时间，就能在大学档案室里发现十五年前是哪个两百公里外的建筑师以精确到厘米的方式设计了这个地方，留下了展示图和她的名字。她完全不知道今天的你会站在这里高谈阔论，但是她能大致预见到这一幕需要的方面：你需要讲出的话被听到，需要坐在讲台的位置，面对学生，他们的人数上限和空间需求需要被考虑。所以在十五年后进入

①②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8-179, p. 179.

③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这个场景时，你觉得不是你创造了这一切，行动的大部分要素在你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地点在你到来之前已经被其他地点通过图纸、设计、木材、混凝土、钢材、清漆及涂料的悄然转义（mediation）制造成一个地方；工人和工匠离开了这里，留下了无需到场也能传导其行动的物；校友用捐赠证明了能动性，得到了铜制证书做奖励。局部（locals）是被局部化的（localized）的地点，地方（place）是被地方化的（placed）地方。要维持这些，门外还要有后勤人员做保障，这样才能保证你和你的学生继续待在“其中”。面对面的互动并不比抽象的情境“更具体”，更有原初的在地性，相反，这些互动应该被想象成扑面而来的众多能动性的终点。^①

正是因为被大量的物包围，人们才觉得行动需要的要素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他们也因此有了行动置身场景或框架的错觉。用拉图尔的话讲：“如果你怀疑这些不起眼的转义者所具有的传导力能塑造一个地方，不妨打开教室门窗看看自己是否还能继续教课……或是在一个艺术展和尖叫的孩子中间以及放着科技舞曲的音箱前讲课。”^② 人与人的互动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离开物与物的连接和客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后就不能存在。顺着物，我们能发现建筑师、工人、校友和更多的物，搞清它们如何通过转译塑造了一个地方，而不是结构、场景等社会理论建构的虚拟领域。这就是拉图尔理解的“溢出”：不跳向虚拟的后景，而是沿着第一步建立的扁平的世界追溯下去，看看局部互动牵扯的要素来自哪里，把它们“挪动、衍射、重新派发和重新打散”到其他地方^③，看它们如何通过管道和联结把一个地点塑造成网络上的节点。拉图尔把这种经由影响力的传导所实现的其他地点在一个地点的在场称为“串联元”（articulator）或“局部元”（localizer），行动者—网络里的任何地点都是其他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其他互动的聚合（assemblage）。

这样，拉图尔没有让任何地点成为追溯的起点，而是强调这些地点在变成节点之前已经是其他网络的终点。他因此强调，没有局部是同位的（isotopic），因为它们总是有其他场所的要素在参与。没有局部是共时的（synchronic），因为不同场所的要素总来自不同时间。没有局部是总揽的（synoptic），因为它们拥有的线索不能在同一时间呈现。没有局部是同质的（homogeneous），因为影响力的传导来自不同种类的物。没有局部是等压的（isobaric），因为有的物更抢眼，有的更静默，它们构成了不均匀的势场。“把全局放入局部”是把行动者—网络拆入可观察的场所，“重新打散局部”是把这些场所翻入更多的场所。两个步骤遵循同一逻辑，都是对微景视域的坚持以及对虚拟领域的拒绝。在第一步，拒绝虚拟领域帮助观察者避免了对“全局”的鸟瞰，把“全局”改造成地方与地方的联结；在第二步，它帮助观察者回避了对“局部”的鸟瞰，避免把“局部”看作是无需追溯的虚拟领域。

拉图尔既没有从独立的后景解释前景，也没有赋予前景以独立地位。一旦拒绝用虚拟领域描述前景，我们就必须打开那个最难打开的前景——传统理论里与宏观对应的个人或自我（ego），不管这个原子般的个人占据的空间被描述成个人意志、主体性、理性、计算、伦理或无意识。在现代西方的本体论里，就算“结构”“社会”“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建构物，个体的存在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当拉图尔强调任何“局部”都需要被打开成网络，他必须像处理“全局”和“局部”那样把人的内在性（interiority）描述成行动者—网络的聚合，不然就为自己的理论留下一个无法被打开和追溯的虚拟领域。

为此，拉图尔发明了“插件”（plug-in）这个说法。在他看来，人不是“具有原初内在性的主体，面对并凝视着由物构成的客体世界，与这个世界形成对立关系或有能力从这个世界中创造某种象征秩序”。^④ 相反，人是在与外在世界的遭遇中才形成他的样子，“即使是在挑火腿这样的日常决定中，你也得益于数十种帮你成为消费者的测量指标——标签、商标、条形码、单位净重、指标、价格、消费者杂志、与其他购物者的讨论和广告”^⑤，简言之，是面向外在事物的开放创造了人的内在世界，帮助他获得了相应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追溯这个过程来理解人的主体性是如何产生的。拉图尔把这个能力获得过程比作安装插件的过程：就像软件使用者通过插件解锁新的功能，人通过接触事物来成为自己，人的内在空间可以被理解成插件的聚合。因此，拉图尔笔下的单体（人和非人）不是一个点或是有边界的物体，也不是一个拥有独立空间的“局部”。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行动者”（actor）需要被舍弃，因为它意味着由行动者占据的节点是完整的

①②③④⑤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94–195, p. 195, p. 198, p. 208, p. 210.

空间，是某种原动力的起点，但是事实上，这个空间只是各种能动性的汇聚之处，其能量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与其他位置的黏附（attachment）。在拉图尔的理论里，我们找不到不能被拆解为聚合物的单体，所有“局部”都是“局部元”的聚合。当作为全局的虚拟领域与作为局部的虚拟领域都不存在，他的方法来到了第三步——串联地点。

六、串联地点：以民族志为例

拉图尔所说的“地点”（site）不同于上面谈到的“局部”（local），因为作为虚拟领域的全局和局部在第一步和第二步已经被拆解。拉图尔的“地点”是行动者—网络中能够被识别的节点（nodes）。作为某个行动的出发点，它对其他地点产生影响，同时又是“许多行动瞄准的目标、轨道交叉的地方，以及大量载体临时停靠的地方”。^① 拉图尔的“地点”不是静止封闭的单元，它向四面八方展开，本身即具有网络性。拉图尔对这个空间样态有自己的比喻：他说如果给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淋巴系统与激素系统着色，那个由线路串联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就是自己要描述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重要的不是地点，而是地点与地点之间的连接，以及连接的维系方式。简单讲，一个地点若要影响另一个地点，就要把事物、能量和行动力完整地传送过去。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应该聚焦具体的地点，而是看地点与地点之间的传送如何实现，通过怎样的载体和媒介。

拉图尔特别关注传送背后的载体。在他看来，衔接地点的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交通工具，可以是流动的信件或纸张，记录信息的图表或模型，或是任何能够被复制和传送的符号。拉图尔将这些载体统称为“形式”（forms），只有通过“形式”，信息（information）才能成为被搬运的“成形之物”（in-formation），从而建立地点之间的连接。拉图尔有时将载体称为“不变的动体”（immutable mobiles），意思是它们能够以相对稳定的方式在地点之间搬运。因为稳定，它们能在不同地点之间实现原信息的传递；因为可以搬运，它们能够建立地点之间的连接。

世界上存在一些被广泛认可的“形式”，拉图尔称其为“标准”（standards）或“类标准”（quasi-standards）。作为最大公约数，它们保证在地点之间传递的信息以相互通约的方式被理解。安娜玛丽·摩尔（Annemarie Mol）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在摩尔调查的医院，动脉硬化患者呈现高度异质化的临床表现，但是“动脉硬化”作为概念是一个被确立的“标准”，所以在面对不同病人时，不同科室和医生还是会认为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疾病并进行协作。诸如“动脉硬化”这样的语言、概念、理论、知识、范畴、标语或口号是拉图尔所说的“召集性陈述”（collecting statements），这些语言形式在地点之间流动，收集行动者的回应，促成网络的关联，召集性陈述是连接地点的“不变的动体”。

通过追溯“形式”“标准”与“召集性陈述”的流动，研究者获得一张串联地点的网络，这样做把社会理论遮蔽的要素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在动脉硬化的例子里，如果只关注医生、病人等人类行动者及其背后的医疗制度，研究者将忽略血压计、彩超设备、高精度影像系统、脉搏波检测仪、踝臂指数测量装置等仪器设备同样决定了“动脉硬化”在某一医院的状态。曾经被视为由人类决定的“社会语境”（一种虚拟领域）被打散成不同地点之间的衔接。^② 在这个新建的地形学里，行动者—网络之外有大量未招募的要素，拉图尔把它们称为“等离子态”（plasma）。在他看来，只要不把“主体性”（subjectivity）定义成人的灵魂，那个被称为聚合物（assemblage）的网络就是个有主体性的网络，它有不断招募新事物并延续自己的能力——是那些未被招募但是随时有可能被招募的对象支撑着行动者—网络的存在。这样，通过打开全局和局部，拉图尔提供了一种非常激进的空间观：在庞大且无法被辨认的“等离子态”的汪洋中，人们可以沿着行动力的传导，追溯出一些由具体链条串联的地点与地点之间的衔接。

拉图尔只有一部虚构的民族志^③，但是在新近出版的人类学作品里，一些作品呼应了他的空间观。斯塔菲高等研究院是世界知名的人类学机构，每年为一部作品颁发斯塔利奖（J. I. Staley Prize），获奖作品需要打

①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0.

② Annemarie Mol, *The Body Multiple: Ontology in Medical Practic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Bruno Latour,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Catherine Porter(trans.),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破传统人类学对世界和人的想象。2017—2019 年，接连有三部获奖作品采用拉图尔的空间观，它们尝试从类似于“等离子态”的汪洋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网络，第一部作品尝试从无边的海洋中发现由海洋微生物构成的网络如何串联研究所、政府、企业、环保组织以及对未来的叙事；第二部作品在庞大的沙漠中探索美墨边境如何形成偷渡者的网络；第三部作品在官僚制这个抽象概念中理解行政文件等纸制品的流动。三部作品关乎不同的主题，但是它们都显示出了拉图尔的空间框架对人类学的影响。

《陌生之海》是 2017 年的获奖作品，作者赫尔姆里奇（Stephan Helmrich）希望通过海洋微生物及基因技术为海洋人类学提供新的框架。赫尔姆里奇把拉图尔所说的“形式”与海洋微生物结合起来。与传统有机体（organism）不同，海洋微生物没有明确的边界，基因交换意味着它们作为“生命形式”（life forms）并不是固定的；在非生物领域，海洋微生物也关乎其他与“生命有关的形式”（forms of life）。比如全球贸易带来的船只航行把海洋微生物随压舱水带到不同的海域；生物细胞的培养技术与基因测序技术决定着人们对微生物的观察和确认。政府、企业、学者、宗教徒和环保主义者也谈论着海洋微生物的过去和未来。人们会发现这些细小生物在最基本的意义上都没有占据独立的空间，它们是拉图尔所说的“通道的节点”（points of passage），把看似单体的生命“打散成流动的关系”。^① 海洋因此成为“流动的介质”（flowing medium），海洋不是用全景视域概括的统一的单体，而是拉图尔所说的聚合物，它在链条发生的每一次变化中把自己延展成网络。也正是如此，人类学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想象海洋，把海洋当成静止均质的整体或是陆地与陆地之间的空间，或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海洋”是在不同地点、领域和媒介互渗中被拼贴出来的生物信息网络和社会文化网络，人类学必须走向海岸、港口、洋流、实验室、数据库等不同地点，才能理解这个网络的移动规模和速度。

在 2018 年的《敞坟之地》里，作者德莱昂（Jason De Leon）把美墨边境的索诺拉沙漠理解为“异质集合体”（hybrid collectif）。拉美偷渡者的故事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要给田野点划定一条明确界线是徒劳的”。^② 没有研究者能跟随偷渡者走完沙漠；也没有人能理解偷渡过程的所有关系。这里的关键是异质集合体里的能动性不能被归因到点位（point locations）——一些看似独立的地点（places）或节点（points），是不同地点之间的关联构成了能动性的来源。为了厘清这些关系，德莱昂追溯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危机如何把厄瓜多尔、秘鲁、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移民带到美墨边境，并依次讲述偷渡过程中的休息点、接应点、补给点、营地，收容所、社工组织、法庭，以及边境巡逻队员实施监控和抓捕的地方，用这些地点串联网络。虽然“我们无法解释或描述这个过程中的所有要素或能动者……也不可能从一个位置辨别体系的所有部分”^③，但是如拉图尔所说，微景视域的优势在于发现被忽略的要素。在索诺拉沙漠，能动者不只是偷渡者、蛇头、劫匪、边境巡逻队等人类行动者，影响偷渡成败的同样包括动物、植物、地势、天气等人以外的因素。只要足够贴近，研究者就能发现“社会”和“政治”包含很多被传统思维排除在外的要素，美国政府把非人世界招募成为边境治理设施的一部分。

在 2019 年的获奖作品《纸的政府》里，人类学家赫尔（Matthew Hull）关注伊斯兰堡的行政和治理。传统人类学在研究国家或政府时往往难以确定调查的边界。一个行政机构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哪些参与者需要被包括进来？行政过程在与外界发生互动时该如何确定调查的范围？是否像既有的社会学分类那样把政治空间划分成“政治家”“官僚”“军队”等不同群体占据的领域和层级？拉图尔号召把“制度”（institution）等空间性的社会学范畴打开成网络^④，赫尔的方案是追溯纸的流动。在他看来，从设计伊斯兰堡这座城市开始，让政治落地的就是包括设计图在内的各类纸质文件，是纸张的记录和表述让现实中的人群和地点被转化为政府部门的处理对象。与此同时，纸质文件勾连起不同人群的观点和看法，调动起人的行动。当城市居民根据纸质档案对不动产进行抗辩，纸串联起官员和非官员，把外在于行政体系的要素纳入到体系。纸的流动串联起城市职能的各个面向，促成了伊斯兰堡的协商与治理。纸构成了拉图尔所说的“串联元”或“局部

① Stephan Helmrich, *Alien Ocean: Anthropological Voyages in Microbial Se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 38, p. 185.

②③ Jason De León, *The Land of Open Graves: Living and Dying on the Migrant Trail*,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p. 127–128, p. 43.

④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4–70.

元”，在招募要素的同时不断变化地点，从自身占据的空间连接更大的空间。赫尔认为，只要追随纸的流动，研究者就能看到行政空间如何与更大的世界连接，明确自己的调查范围和尺度，政府行政体系这个抽象的研究对象被打开成由纸串联的拉图尔意义上的网络。

七、拉图尔与几种人类学空间观的比较

本文着眼于人类学的空间框架，深入讨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孕育的空间观。拉图尔不认为在微观行动背后有“全局”作支撑，不管这个全局被称作“结构”“情境”“系统”“社会”或“文化”。他也不认为在台前的局部地带有无法被打开的“当下”“个体”和“自我”。在他看来，“结构”“体系”“秩序”“社会”“文化”“互动”是社会理论建构的虚拟领域，它们背后是一个更根本的建构——即后景与前景的嵌套关系。拉图尔不关心局部背后的结构和后景，也不承认前景有独立存在的可能。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停止从后景跳向前景，转向追问它们如何在现实中联结。拉图尔关注不同性质的要素如何在具体地点汇合，在地点与地点之间连接，通过何种载体传导。在由此形成的扁平的地势里，所有局部被打开成网络，所有网络也需要在具体的地点说明。

“行动者—网络”这个说法本身即利用了矛盾的效果：一端是居中的“行动者”，另一端是去中心化的“网络”。拉图尔用连字符联结“行动者”与“网络”，就是希望说明自己建立的不是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也不是行动者与网络，而是“行动者—网络”，这个网络的前景和后景是相同的——“行动者”就是“网络”。“行动者—网络”的前半部分表明“世界的宏大要素都孕育在狭小的空间”，后半部分表明“世界是通过何种载体、线索、轨道和信息类型汇聚到那些地方，在经历转换后被挤压出边界”。^① 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扁平世界中追溯地点与地点之间的连接，相比于预设并不存在的虚拟领域，拉图尔认为自己给出的是更具经验性的描述世界的办法。

对于人类学，这种塑造是革命性的，因为传统人类学尝试从田野中提取的正是拉图尔试图批判的虚拟领域。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对这一点有深刻的揭示。在经典人类学家的作品中，研究者不仅要把现象放入语境，而且要把一个现象与田野中的其他现象关联起来。比如在整体论（holism）里，讨论礼物交换需要讨论一个地方的亲属制度和产权结构，后者可能关联到地方的土地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人类学把地方社会当作有机的整体，强调从整体进行解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跨地区的比较，最终回到“体系”“结构”“秩序”“文明”等宏大概念。斯特拉森敏锐地指出，这个过程是用人类学家的视角（perspective）去框定材料：首先以人类学的学术理论为后景，去建构原本不存在的“作为整体的社会”；接下来用这些被建构的“社会”作后景，去解释和比较社会的具体方面。这是人类学长期存在的“社会思维”（the society thinking）。人类学描绘的“社会”和“文化”并非事实，而是拉图尔强调的虚拟领域，人类学是在用自己创造的层层叠叠的后景，去覆盖并取代真实的社会。^②

当人类学建构“社会”和“文化”等并不存在的后景，一种宏观与微观的二分随之生成——位于前景的个体与行动，被置于后景的社会和文化之内。经典人类学强调生物意义上的人（例如新生儿）需要经过社会化过程才能成为“完整的人”，这预设了人在自然层面的先在性，让“个体”（individual）成为人类学分析所未能触及的单体。^③ 在这个框架下，“关系”（relations）被理解成这些预先存在的单体之间的作用，并借由“社会”这个宏观的后景来统摄，这是“社会”与“个体”被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的原因。换句话说，经典人类学的“社会”有着“个体”这个最不言自明的前景作支撑，这是两个虚拟领域能同时存在的原因。为了压平网络，拉图尔把人理解成可以追溯的“插件”的聚合，这种策略在斯特拉森等其他人类学家的作品

①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9–180.

② Marilyn Strathern, M. R. Crick, Richard Fardon, et al., “Out of context: the persuasive fictions of anthropology [and comments and repl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8, no. 3, 1987, pp. 251–281; Marilyn Strathern, “Parts and Whol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 in a Post-plural World,” in *Conceptualizing Society*, Adam Kuper (e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75–104.

③ Marilyn Strathern, “Parts and Whol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 in a Post-plural World,” in *Conceptualizing Society*, Adam Kuper (e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80, p. 92.

中也能找到。

比如，在斯特拉森研究的美拉尼西亚，礼物生产和交换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礼物交换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网络，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每个送出的物都等同于人，送出礼物是送出自我的一部分。这样，交换过程中的两个主体并非是有边界的个体，相反，个体是通过切割和送出自我来实现连接，关系网络中的每个个体都包含他人贡献的部分，不像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那样有着完整自治的边界。斯特拉森用“分体”（dividual）形容这种人观（personhood）。作为“分体”的“个体”是社会关系生产出的“合成人”（composite person）、“可切人”（partible person）与“可分人”（divisible person）。他们不再是自成一体的单体，也不再被想象成社会关系和行动力的源头。“分体”是社会关系的凝结之处，在拆分和流动中与其他分体结合。^①与拉图尔“把全局放入局部”以及“重新打散局部”类似，“分体”把社会性（sociality）装入个人，又把无法打开的“个体”拆解成社会关系的交换和积累。在这个由分体拆解和聚合所组成的网络里，每个被送出的物都等同于人，体现了拉图尔强调的人与物的对称关系。

斯特拉森和拉图尔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思想实验性质，他们希望揭示社会科学那些看似天然的框架——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前景与后景——都是理论建构的虚拟领域，都可以被拆解成网络。但是两位作者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首先，礼物交换的原型是人与人的互动，因此在斯特拉森的分析中，能动者始终是人，“分体”衍生于人与人构成的二元关系的叠合^②，不像拉图尔那样把人、物、技术、制度与话语等异质要素全部纳入网络。其次，斯特拉森是以尺度（scale）为核心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在她看来，正如绘画者对透视关系的选择，人类学能看到什么取决于对观察尺度的选择。随着观察距离的变化，研究者能看到的对象及视域的结构都会发生变化。“社会”与“个体”是人类学在某一尺度上看到的对象，在这个距离上，世界呈现这种样子。我们可以像拉图尔那样采用更加贴近的方式看到更细密的联结，但是这些联结依然是视角的产物，研究者必须承担起“裁剪网络”（cutting the network）的责任——决定哪些关系能进入视野，哪些需要被搁置，而不是像拉图尔那样去无限追溯网络。拉图尔的写实主义关心地点与地点之间的联结如何发生，斯特拉森尝试从美拉尼西亚发现的是对观察尺度的选择如何塑造研究者能看到的世界。拉图尔的方法论更加唯物，斯特拉森的理论更加内观。斯特拉森的地形学并未像拉图尔那样贴近被研究物，建立扁平的世界，她的理论保留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分析距离。^③

另一个可以与拉图尔对比的是英戈尔德（Tim Ingold），后者的“织网”（meshwork）概念同样强调联结和串联。与拉图尔一样，英戈尔德认为能动性（agency）不能被还原为人的思想和意志，但是在他看来，能动性只属于有机体（而不是非人），因为行动（action）必须以生命体的身体存在和神经感知为基础，这让“织网”概念呈现出与行动者—网络不同的空间框架。英戈尔德认为，当生命体在所处环境中生长，就能形成对周边环境的感应，这种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身体感应构成了能动性的基础，这是一种习得的能力和技巧（skill）。英戈尔德把生命体对世界的注意力（attention）理解成“线”（lines）的积累和缠绕。正如棉线在缠绕中形成丛结，身体感知、劳作、移动和延展都会留下痕迹，形成织网，这种由线条积累所形成的织网不像行动者—网络那样可以被还原为点对点的关系：即它不能被还原为地点（sites）与地点的串联，或是占据地点的实体（entities）之间的串联。不管如何拆解，在拉图尔的网络里，具有实体性的是局部的点（比如人和非人），而不是它们之间的连接，“连接”只是用来表示行动力的传导方向。但是在英戈尔德的织网中，线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material presence），它是延绵不绝的身体痕迹，无法被切割为彼此独立的片段。^④

拉图尔把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 ANT）比作贴在地上的蚂蚁（ant），呼应这个文字游戏，英戈尔德把自己的理论比喻为“蜘蛛”（spider），意思是能动性作为“有技巧的实践包含长期发展出的具身感应”

① Marilyn Strathern, *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 Studies in Melanesian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② Alfred Gell, "Strathernograms, or, the Semiotics of Mixed Metaphors," in *The Art of Anthropology, Essays and Diagrams*, Eric Hirsch (ed.),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1999, pp. 1-28.

③ Marilyn Strathern, "Cutting the Network,"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2, No. 3, 1996, pp. 517-535.

④ Tim Ingold, *Lines: A Brief History*, Routledge, 2007.

(Skilled Practice Involves Developmentally Embodied Responsiveness, 每个词的首字母连接)。英戈尔德用蜘蛛和蛛网解释自己与拉图尔的区别。当蜘蛛捕食蛛网中央的昆虫,拉图尔会把蜘蛛、蛛网与被捕食的昆虫视为同一个行动者—网络中的实体,并强调这三个实体具有同等的能动性,能动性来源于这三个位置之间的影响力的传导。但是在英戈尔德看来,在空气中飘荡的蛛网是蜘蛛的身体产物,织网与创造它的生命是一体的,不能与蜘蛛的身体分割开来,不能像行动者—网络那样拆分出一个个单体,蛛网不能被当作与蜘蛛等同的具有能动性的单体,蜘蛛是在自己创造的织网边缘与另一个生命的织网相遇。^① 英戈尔德强调的是线的生成、延绵与纠缠;拉图尔强调的是点的连接、追溯与组装。前者描绘的是生命之线延展出的浑然一体的生境,后者描述的是物质实体通过非物质关系结成的网络。

还有学者从权力角度批判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福柯指出任何空间形态都关乎权力的运作,当拉图尔强调我们不能用想象的应然遮蔽“非人”等社会理论忽略的东西,他给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框架。这种广泛的包容性使他的理论没有所谓“他者”,这就削弱了从边缘位置反思权力的可能。研究者把目光聚焦在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从而忽略边缘群体作为政治主体所具有的经验。^② 此外,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追溯影响力的传导时往往给予每个行动者以同等分量的考量,这就使网络上的所有节点看上去非常平均化,没能突出哪个位置更值得批判,哪些行动者(比如国家或跨国公司)比其他行动者(比如地方民众)更值得反思。^③ 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把道德和政治批判当作首要的目标,其以描述为中心的特点会掩盖关键行动者(特别是人类行动者)的道德动机和责任。实际上,当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追溯关系来回答一个网络如何形成稳定的状态,它面临的更大质疑是资本主义等宏大权力并不能被认为是在具体组装中形成,对虚拟领域的否定反倒成为这个理论在权力批判上的弱点。

(责任编辑:朱颖)

Anthropology and Latour's Theory of Space: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LI Jin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anthropology has sought to move beyond an exclusive focus on the “local” and to attend to broader questions of routes and networks. This shift revealed how a Euclidean conception of space has shaped traditional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Actor-network theory helps to extend this line of inquiry. It proposes that analysis should begin with local interactions in order to trace how influence circulates, and then link these sites into accounts of the global. At the same time, each node in the network, as a site where local interactions take place, is also a node within other actor-networks orient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For Latou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must be traced on a flat plane, rather than understood as a nested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Euclidean spatial thinking. By placing Latour's spatial conception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space, this article show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unsettles some of anthropology's most deeply ingrained spatial assumptions. Drawing on recent award-winning ethnographies, it argues that Latour's reconfiguration of space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shifts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Key words: Latour, actor-network theory,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① Tim Ingold, “When ANT meets SPIDER: Social theory for arthropods,” in *Material Agency: Towards a Non-anthropocentric Approach*, Carl Knapett and Lambros Malafouris (eds.), Boston, MA: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8, pp. 209–215.

② Susan Leigh Star, “Power, Technology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ventions: On Being Allergic to Onions,” in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John Law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26–56.

③ Eric Laurier and Chris Philo, “X-Morphising: Review Essay of Bruno Latour's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vol. 31, No. 6, 1999, pp. 1047–1071.